

中重要的方式就是借外債。1911 年 12 月 12 日，黃興與宋教仁、陳其美聯名致電日人內田良平：“請您以黃興、宋教仁、陳其美、伍廷芳、李平書等人名義，草簽一項從三井洋行借款 30 萬元、年利 7 分的臨時合同，並委您接受現款。”¹ 此項借款，由張謇擔保，並經森格活動，於 1912 年 1 月 24 日達成協議。此外，孫中山、黃興還曾計劃以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等形式向日本借款，都必須利用森格的力量。本函稱：“敝政府委託貴國三井之森格君籌措資金一事，務祈賜以助聲。” 目的在希望井上對森格予以支持。

此函發出後，1 月 19 日，黃興再發一函，分頭遞送井上馨與另一元老山縣有朋，希望他們“以鼎力扶助民國，早邀各國之承認。”² 然而，井上等並沒有給予黃興以急需的幫助。日本政府不肯承認南京臨時政府，日本財閥也不肯提供大筆資金。結果，孫中山、黃興不得不接受袁世凱的和平條件。

陳其美的“三次革命”設想*

——讀日本外務省所藏陳其美致楊以均密函

一、密函及其來源

在日本外務省檔案中，保存著一通陳其美致楊志平的函笥，全文如下：

志平先生同志：

前由潘君月樵介紹，滬江戰事得蒙足下仗義疏財，接濟維持，已呈請岑大元帥註冊存案矣。金陵之役，同志血戰三星期，復為張賊奪去，非人

謀之不臧，實天助袁逆、張賊也。可恨之極！總之，吾輩抱定宗旨，百折不回，現已由滬江同志議決，以一半往長崎赴會，聯合日人，籌餉購械，以台灣為根據，從閩、浙進行。復遣同志多人，赴大連聯絡翳黨英傑，勾結宗社黨人，在北方定期起事。江浙方面概歸鄙人主持一切，將來仍請閣下召集洪門同志，共舉義旗，直搗金陵，先誅張賊，後討袁逆，以雪前恥，掃除專制惡毒，重立共和政體，吾黨幸甚！再者，以後往來信笥，總宜秘密，因郵局中人查檢甚嚴，恐有泄露，故此次特派心腹前來，與閣下當面接洽，如蒙允准，即望將回件賜交來人帶回。邇來南北偵探遍地，吾輩舉動切宜慎密，凡軍火文件皆存在日人行中。遵〔尊〕處係屬地，尤須謹防。倘再有疏虞，則一番心血又成畫餅。鐵君來常，事竣尚須往蘇、杭一行。倘有需款，即乞尊處點付可也。此頌台綏！

美啟

十三¹

信末有楊以均手記：“已據信照付鐵君洋五百元。此記。十五。” 鐵君，不詳何人，當係陳其美的同志，到常熟、蘇州、杭州負有特別任務者。

此函原係北京政府外交部 1913 年 11 月 26 日致各國公使團照會的附件。該照會稱：

近日准江蘇省報告稱：前以亂黨匿居上海租界，潛謀暗殺，特派偵察得悉，亂黨起事時，有常熟人楊以均，曾受陳其美委任，為駐紮常州軍需長，有籌款接濟亂黨情事。現復查獲該逆之洪幫票布及陳其美親筆函件，並繕具楊逆助亂及現謀情形節略一紙等因。查陳其美等前在南省稱兵倡亂，罪狀昭彰。現又密謀不軌，不特擾害中國治安，即於外人生命財產，亦多危險。近據密探調查確實情形，該逆仍匿上海，以租界為遁逃藪，以圖再舉。既經查獲票布及親筆函件，證據確鑿，斷難姑容。²

1 毛注青《黃興年譜長編》，中華書局 1991 年版，第 245—246 頁。

2 同上，第 279—280 頁。

* 原載台北《近代中國》第 131 期，1999 年 5 月。錄自楊天石《國民黨人與前期中華民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7 年版。

1 日本外務省檔案，MT16141，3224-3225。

2 同上，MT16141，3222。

據此，知此函為江蘇省有關方面緝查所得，轉報北京政府外交部，外交部作為陳其美謀亂證據提供出來的。

當年 8 月 3 日，袁世凱政府曾限令陳其美自首，同時行文上海領事團，要求將陳其美等人驅離租界。次日，陳其美致函領事團，提出抗議。領事團沒有採取相應措施，於是，北京政府就將交涉升級，致函公使團，要求“訪拿”陳其美等人，交上海鎮守使鄭汝成等訊辦。北京政府特別寄希望於日本，因此，照會誣稱：“據上海探報，亂黨秘計，已製軍衣千套，均仿北軍式樣，以焚害日本重要官商署屋，激成外釁為宗旨。”云云。

楊以均，據北京外交部附抄函件二，知道他號志平，綽號楊老書，常熟縣人，洪幫大頭目，又名老五。¹ 其他不詳。

本函不見於已刊的《陳英士先生文集》或紀念集。它為研究陳其美的“三次革命”設想提供了重要資料。

二、密函作於“二次革命”全軍覆沒之際

1913 年 7 月 12 日，李烈鈞佔領江西湖口炮台，以反對袁世凱為目標的“二次革命”爆發。15 日，黃興進入南京，宣佈獨立，被推為討袁軍總司令。16 日，陳其美被推為駐滬討袁軍總司令，18 日，宣佈上海獨立。“共圖討賊，保障共和”。22 日，陳其美集合所部，分四路出擊。23 日，進攻江南製造局、高昌廟、龍華等處。25 日，退守吳淞炮台。29 日，江蘇討袁軍失利，黃興離開南京。8 月 12 日，上海的袁世凱軍隊在海軍協助下進攻吳淞。次日，上海討袁軍失敗。函中所言“滬江戰事”，指此。從函中可知，此次上海討袁之役，曾得到楊以均的經濟支持。“岑大元帥”，指岑春煊。“二次革命”的實際領導者雖是孫中山，但名義上的“各省討袁軍大元帥”則是岑春煊。

黃興出走後，何海鳴迅即進入南京，並於 8 月 8 日佔領都督府，自任江蘇討袁軍臨時總司令，繼續抵抗袁世凱軍隊的進攻。8 月 14 日，袁軍張勳等部

¹ 日本外務省檔案，MT16141，3226。

攻佔天保城，但不久即被討袁軍奪回，張勳部慘敗。此後，為爭奪天保成，雙方多次反復拉鋸，討袁軍英勇戰鬥，給了袁軍以嚴重殺傷。9 月 1 日，張勳攻入南京，討袁軍與張勳部展開激烈巷戰。次日，終因寡不敵眾失敗。函中所言“金陵之役，同志血戰三星期，復為張賊奪去”，指此，它是“二次革命”中最激烈、也是最英勇的一次保衛戰。

9 月 12 日，重慶熊克武所率四川討袁軍被圍攻，潰散。至此，歷時兩個月，涉及江西、江蘇、廣東、福建、四川、安徽、湖南等省的“二次革命”全軍覆沒。

密函所署時間為“十三日”。根據日本外務省檔案，陳其美 1913 年到達東京會見孫中山的時間為 10 月 7 日，¹ 因此，密函的寫作時間應為當年 9 月 13 日，距張勳攻入南京 12 天，距“二次革命”全軍覆沒僅 1 天。

三、密函所反映的陳其美的“三次革命”設想

密函稱，南京為張勳攻陷後，上海和江蘇的革命黨人聯合議決，分三路進行：一路：以同志之半赴日本長崎，“聯合日人，籌餉購械，以台灣為根據，從閩、浙進行”。二路：派遣同志多人，“赴大連聯絡鬍黨英傑，勾結宗社黨人，在北方定期起事”。三路：江浙方面仍由陳其美主持，仍請楊以均“召集洪門同志，共舉義旗，直搗金陵，先誅張賊，後討袁逆，以雪前恥。”三路的總目的則是：“掃除專制惡毒，重立共和政體。”這是“二次革命”失敗後革命黨人最早制訂的“三次革命”計劃。

“二次革命”時，革命黨人動員了當時所可能動員的力量，準備與袁世凱進行殊死搏鬥，但是，不旋踵間，灰飛煙滅，孫中山、黃興等人紛紛出走，革命黨人中瀰漫著一片悲觀、失望的氣氛。黃興詩云：“黨人此後無完卵，民賊從茲

¹ 日本外務省檔案，甲秘第 182 號，MT16141，2336；乙秘第 1420 號。MT16141，2324。日本方面有情報稱：陳其美於 9 月 4 日到達長崎，5 日赴東京，甚至有 9 月 4 日赴東京之說，均誤。根據陳果夫回憶，9 月 26 日，陳其美尚在上海，曾回海寧路 10 號探家（見何仲簫編《陳英士先生紀念全集》，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57 輯，第 50 頁）；而且，陳其美也不可能到達東京後 1 個多月不去見孫中山。從各種材料判斷，陳其美 1913 年赴日的時間應為 10 月初。

益恣兇”，¹ 這恰是當時許多革命黨人悲憤心情的寫照。此後，革命黨人中遂逐漸演化出緩進與急進兩派。緩進派認為，“二次革命”使黨人元氣大傷，“今無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進”，² 主張暫停革命，長期準備；急進派則認為袁世凱實為孤家寡人，外強中乾，主張繼續推進反袁的武裝鬥爭，儘早推翻其專制統治。陳其美的密函反映出，“二次革命”雖已全軍覆沒，但他不僅沒有絲毫灰心，反而立即在上海召集會議，制訂出新的起事計劃，並且立即著手實施，既充分表現出他反對專制、擁護共和的堅定立場，也充分表現出他的不屈不撓、百折不回的革命意志。在中華革命黨時期，他得到孫中山的充分信任和重用，不是偶然的。

密函中，陳其美提出的閩浙一路，孫中山 1900 年惠州起義時有過近似的計劃。³ 江浙一路，是 1911 年中同盟會的方略，而選擇東北，雖有 1907 年 4 月宋教仁遼東之行的前例，⁴ 但主要是陳其美總結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失敗原因的結果。關於此，蔣介石回憶說：

陳公嘗謂辛亥、癸丑二役，皆不能貫徹革命黨之三民主義者，以東北各省之根基薄弱，不能直搗北京，以掃除專制惡魔之巢穴，自今以往，如徒注重南方，而於北方仍不稍加意，是由覆其轍而不自悟者也。且袁軍密佈於東南，防範壓制，不遺餘力，如不度勢量力，率意逕行，其無異於鄒與楚敵也，其不成也必矣。故謀第三次革命，當於東北數省培植根基，以為犁庭掃穴之計。⁵

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失敗的原因很複雜，但是，從軍事的角度觀察，南方蜂起，北方平靜，缺乏就近“犁庭掃穴”、“直搗北京”的力量，不能不是

1 《黃興集》，中華書局 1981 年版，第 347 頁。
2 《與陳炯明等聯名通電》，《黃興集》，第 397 頁。
3 參見拙作《跋日本政府有關惠州起義的電報》，《海外訪史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3、65 頁。
4 參見《宋教仁日記》，1907 年 4 月 9 日，《宋教仁集》，中華書局 1981 年版，第 726—728 頁。
5 《陳英士先生癸丑後之革命計劃及事略》，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陳英士先生紀念集》，台北 1977 年版，第 8 頁。

一個原因。陳其美的這一戰略思想，後來深刻地影響了蔣介石。¹

革命當然需要基本力量，但是，這並不妨礙可以有臨時的同盟軍。陳其美密函中提到的要加以聯絡的“鬚黨英傑”，就是近代史上通常所說的“馬賊”；所說的“宗社黨人”則是以清朝貴族升允為代表的復辟力量。這兩支隊伍當然不能成為革命的依靠，但是，在反對袁世凱這一點上，雙方又可以在一定的條件下合作。密函表現出，陳其美不僅有反對專制，維護共和的堅定性，而且有某種策略的靈活性。

四、執行情況

陳其美密函中所提出的“三次革命”設想，除閩浙一路外，其他兩路後來都是部分地執行了的。

“二次革命”期間，陳其美即曾派人到東北，遊說張作霖等人，配合南方起事。² “二次革命”失敗後，原在上海的銀行家沈縵雲即遷居大連，多方聯絡各種力量，策劃舉義。據 1914 年 1 月 14 日日本方面情報稱：

正居留大連敷島町的沈萬〔縵〕雲，攜來相當資金，被推舉為亂黨之首，並令賊之魁首徐小虎負責鐵嶺、高〔溝〕幫子、鳳凰城方面，令彭春亭負責軍隊方面，令徐寶負責對旅順都督府做工作，令三谷末次郎運送武器，劉藝舟任臨時司令部總司令，指揮錦州方面的李東仇，並同關東都督府及伊藤保持聯絡。還同升允的部下顏興應在大連的中和棧聚會，組織“同心會”，正試圖通過升允和日本人的媒介共同舉事。³

日本人所描繪的這一圖景正是陳其美密函中所言聯絡“鬚黨英傑”與宗社

1 1923 年 8 月，蔣介石在《致蘇俄負責人意見書》中說：“中國革命發源於南方，當時，革命黨不能應用其人民種族革命之心理，實行其黨魁直搗北京之計劃。”（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檔案）因此，他向蘇俄方面提出，在中國西北或蒙古庫倫建立根據地，以利進攻在北京的直系軍閥政府。參見拙作《蔣介石的赴蘇使命及其軍事計劃》，收入《蔣介石秘檔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即出。
2 《乙秘第 289 號》，《孫中山在日活動密錄》，第 666 頁。
3 《山座公使致福田都督》，《孫中山在日活動密錄》，南開大學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38 頁。

黨人，共同舉事的設想。沈縵雲原是陳其美任滬軍都督時的財政總長，是上海資本家中始終革命的少數人物之一。他在“二次革命”失敗後，不像其他人一樣亡命國外，而是遷居大連，顯然，應屬革命黨人的派遣。陳其美密函曾有“復遣同志多人”赴大連的計劃，沈縵雲應是這些“同志”中的一個。

在敘述了沈縵雲的活動之後，日本情報繼稱：

戴天仇、陳其美也來到大連，企圖和肅親王派宗社黨取得聯繫。還計劃派人到新義州方面，趁結冰期佔領安東縣。¹

日方的這一檔案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了沈縵雲和陳其美二人之間活動的聯繫。陳、戴到大連後，迅即會見沈縵雲，了解情況，有所協商。²

關於陳其美的東北計劃，日本方面的檔案多有記載，如：

關於革命之策源地，尚不明了，但據傳，將以大連為據點，在奉天附近舉起革命大旗。同時在各省起義，一齊壓向袁政府。³

大連流亡者有三派，其數八十四名。此外還有宗社黨主要成員十數名，相互反目，但因第三次革命迫近，近來採取一致行動，與張作霖部下聯合，等待解冰期，計劃先在奉天城舉事。滿洲諸方面都有他們的人。從本地給陳其美發了電，要求陳其美、戴天仇來大連，研究有關上述計劃。⁴

舉事之際，首先佔領咽喉山海關，斷絕交通。然後派人率匪西下，由綏遠、張家口進襲，直達內地。南通山東、河南，西聯山西、陝西，糾合白匪，夾擊北京。⁵

這些記載表明，陳其美等東北計劃的目的在於佔據有利位置，從近處向北京的

1 《山座公使致福田都督》，《孫中山在日活動密錄》，南開大學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38 頁。

2 《乙秘第 289 號》，同上書，第 676 頁。

3 《長崎縣知事李家隆介致外務大臣男爵牧野伸顯》，同上書，第 639 頁

4 《乙秘第 124 號》，同上書，第 640 頁。

5 《朝憲機第 180 號》，同上書，第 645 頁。

袁世凱政府進攻，實行革命黨人多年神往的“首都革命”。

當時，東北革命黨人急於起事，向陳其美報告，已經“預備完全”¹。1914 年 1 月 19 日，陳其美、戴季陶、山田純三郎離開日本，趕赴大連。舟中，陳其美致函陳果夫稱：“今密往大連，審度情形，以期有為。究竟能否進行，尚難必也。叔當忠於國，願以身殉之無憾！”²可見，他是懷著要做一番大事業的心情啟程的。不過，他在路上就得了感冒，胃腸病復發，這使他一到大連就住進了醫院。此後，他困於經費，難以作為。聯絡“翳黨英傑”和宗社黨人，都需要鉅款，1 月 28 日《致諸兄函》稱：“仍以籌款為著手辦法，且俟第一著之成績如何，再定後路也。開辦費尚不敷，除申請中山先生撥濟外，已專函介石，迫老夫子速履行前約之數以濟眉急也。”³此後，他不斷寫信，說明“無大款難補大局”，“此間費已用罄為慮也”。⁴

除經費困難外，當時統治旅順、大連的日本當局也多方阻撓。《致諸兄》函稱：“此間事外交干涉日緊。前者所稱可以商酌之關東都督已受袁氏籠絡矣。不但拒不見面，而且已命其部屬將下逐客令矣。看來難望有為也。”⁵這裏所說的“關東都督”，指日人福島安正。沈縵雲、陳其美雖然都寄希望於他，但實際上，自陳其美等踏上大連土地起，就一直處於日警的監視下。福島並讓大連民政署長轉告陳：“不得使大連成為與革命黨有關的策源地。”⁶2 月 3 日，陳其美外出，日警居然拒絕他登車。這樣，陳其美不得不接受孫中山的意見，於 3 月 15 日離大連返日。

陳其美返日後，並沒有放棄他的東北計劃。同年 6 月，孫中山和陳其美派陳中孚到東北。9 月 4 日，在本溪湖舉事，被日本警備隊鎮壓。⁷陳其美做得有點聲色的是中部江浙方面。

陳其美赴日後，蔣介石受命留守上海法租界，策劃江浙起義。5 月 30 日，

1 《致諸兄》，手跡，《陳英士先生紀念全集》，第 50 頁。

2 《在台中丸旅次致果夫函》，《陳英士先生文集》，黨史會 1977 年版，第 27 頁。

3 《致諸兄》，手跡，何仲藩編《陳英士先生紀念全集》，第 47 頁。

4 《致周淡游等》，手跡，《陳英士先生紀念全集》，第 58 頁。

5 《陳英士先生紀念集》，第 52—53 頁。

6 《關東都督男爵福島安正致外務大臣男爵牧野伸顯閣下》，《孫中山在日活動密錄》，第 664 頁。

7 日本外務省檔案，乙秘第 1879 號、1912 號、1951 號；又，《中華革命黨黨員陳中孚之談話》，《中國流亡者陳中孚之談話》，均見《中國革命黨問題》，第 14 卷。

蔣介石計劃進攻閩北、真茹、滬寧火車站等處，傳檄討袁。不幸事機泄露，部屬陳喬蔭等被捕殺，蔣介石流亡日本。¹ 陳其美的江浙討袁計劃再次受到挫折。

1914 年 7 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革命黨人認為是個機會，躍躍欲動。8 月 28 日，孫中山、陳其美、蔣介石、戴季陶、山田純三郎等集議，決定將革命軍總司令部設在上海，派蔣介石等回國進行。² 對此，蔣介石回憶說：“當時歐戰已啟，青島開戰，時期不同，局勢一變。前之謀於東三省以養成潛勢力，使其一舉而成者，終以該地勢力薄弱，不能速舉，（英士）乃注全力於江浙二省，而以東三省作為繼起之區。請總理委任夏君爾嶼主持浙事，范君鴻仙主持滬事，吳君藻華主持蘇事，極力猛進。”³ 9 月 12 日，陳其美在東京樂觀地宣稱：“經我等同志臥薪嘗膽，日夜奔走，第三次革命之準備已漸次就緒，計劃近日內在南方開始行動。此次行動遠非二三日發生於本溪湖方面小規模行動可比。一旦革命開始，計劃在暫時之間取得一二省，達此目的後，孫文及我等立即回國。”⁴ 同月 20 日，范光啟（鴻仙）密謀進攻上海製造局，事泄被刺。10 月，杭州秘密機關被破壞，殉難數十人。江浙討袁計劃又一次受到挫折。

1915 年 2 月，陳其美以義無反顧的精神回到上海，親自領導江浙地區的討袁活動，先後策劃並領導刺殺鄭汝成、肇和兵艦起義、進攻江陰炮台等多方面的活動。一直到 1916 年 5 月被刺，陳其美始終在江浙地區堅持不懈地戰鬥著。

1915 年 9 月，陳其美到東京參加中華革命黨會議時，向孫中山建議說：“時期急促，迫不及待，東南諸省，袁氏爪牙密佈，如不從西南方面蹈隙抵虛，則事難為也。”⁵ 這是陳其美對自己原擬“三次革命”計劃的修訂，這一修訂是正確的。3 個月之後，雲貴高原就飄起了討袁義旗。

附記：本文為 1999 年 4 月在湖州召開的陳英士生平與事業討論會而作。

1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檔案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0—21 頁。
2 日本外務省檔案，乙秘第 1691 號。
3 《陳英士先生癸丑後之革命計劃及事略》，《陳英士先生紀念集》，第 8 頁。
4 《中國流亡者陳其美之談話》，《孫中山在日活動密錄》，第 690 頁。
5 蔣介石《陳英士先生癸丑後之革命計劃及事略》。

袁世凱政府指望的中日“互助”*

人有遺傳病，有時，政府之間也有遺傳病。前文談過，清政府得了“恐孫症”，多次要求日本當局驅逐孫中山；不幸，袁世凱政府也患上了此症。日本外務省檔案中有一份《節略》，中云：

本國此次內亂，實由孫文、黃興、胡漢民等煽惑主使，以致使本國民商損失產業甚鉅，即各國商民在長江流域者亦頗受影響，本國人民莫不痛心切齒於該亂黨等。現聞孫文、黃興、胡漢民等已赴貴國境內留寓。距本國一葦可航，難保不借為根據，再圖倡亂。在貴國篤念邦交，自當有防範之法。但本國人民必多憂慮猜疑，恐生誤會，應請貴大臣轉達貴政府，以東亞和平為念，務籌正當切實辦法，以弭禍亂，而息猜疑，固不徒本國人民之幸也。

從內容上看，這是袁世凱政府的外交部遞交日本駐華公使館的，時間當在 1913 年 8 月，“二次革命”失敗，孫中山等流亡日本之後。由於是外交公文，所以話說得很婉轉，也很花了一點腦筋。你看，它不僅指控孫文等對“本國民商”的“危害”，而且特別指出，“即各國商民在長江流域者亦頗受影響”，企圖以此打動日本當局。至於應該怎麼辦，《節略》沒有明說，只是希望“務籌切實辦法”，結尾特別意味深長地點明：“固不徒本國人民之幸也”，那意思是清楚的：“處理”了孫中山等人，對日本帝國主義者也有好處。

無奈，日本政府這時仍持兩面政策，並未採取任何行動。孫中山仍然居留日本，並於 1914 年 6 月在東京成立中華革命黨，積極策劃反袁鬥爭。袁世凱政府坐不住了，於當年 9 月 9 日由駐日公使陸宗輿面交日本外務省一份照會，提

* 原載《團結報》，1988 年 1 月 2 日。錄自楊天石《國民黨人與前期中華民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7 年版。

出三項條件：

（一）日本政府對於中國重要亂黨，如孫、黃、陳、李及曾有令指捕之人之寄居日本者，一概正式宣佈放逐，永遠不准居留日本境內，其正式退出日本者，不准再行登岸，未在日本者一概拒絕來日。

（二）日本政府對於亂黨之徒眾，如有在日本作反對中國之行為，經中國政府之請求，即應按律懲辦；其有犯刑事證據，經中國請求引渡者，日本應即引渡。

（三）不在日本之亂黨，如與日本人有秘密合謀舉動，日政府應嚴密取締，並按律懲治。日本人如有庇護或援助在日本或日本外之亂黨，日政府均應實行禁止。其遷居日本租界及租界地之亂黨，經中國請求引渡，日本政府即應交出。

這份照會不僅要求日本政府“放逐”孫中山、黃興、陳其美、李烈鈞等人，而且要求“引渡”；不僅要求“懲辦”中國之“亂黨”，而且要求禁止日本友好人士援助中國革命，口氣實在大得很，硬得很。

袁世凱政府一向搞的是奴才外交，是什麼原因使它腰板突然硬起來了呢？原來，這年8月，日本對德宣戰。駐華公使日置益面見袁政府外交總長孫寶琦，無理要求按1904年日俄戰爭先例，將山東省黃河以南劃為日本對德“作戰區域”，並撤退膠濟鐵路中國駐軍。同月30日，袁世凱政府通知陸宗輿轉告日本政府：“膠濟路濰縣以東至青島一帶，日人可任意佈置”。於是，日軍第18師團2000餘人便於10月2日在山東黃縣登陸。這樣，袁世凱政府便覺得“有助”於日本政府了，要求“放逐”、“引渡”孫中山等人的照會正是在這一情況下提出的。

照會最後說：

以上三項內酌量實行，則於中政府此次助日，亦可表示日政府真誠互助之意。

這真是妙不可言的畫龍點睛之筆。中國讓出自己的一大片領土來任日軍廝殺，而日本政府則“逮捕”並“引渡”孫中山等“亂黨”——這就是袁世凱政府所指望的中日“互助”。

黃興與日本駐舊金山總領事的通訊^{*}

——讀日本外務省檔案之六

1914年9月，黃興在美國加利福尼亞期間，曾因膠州灣問題致函日本駐舊金山總領事沼野安太郎。日本外務省存有該函的英文打字稿，國內外學人迄今尚未論及。現譯介如下：

親愛的先生：

我打算在幾天內離開這裏，這是很遺憾的。我渴望再次訪問您，而時間已經不允許了。當我重訪舊金山之際，各事叢集，偶有空暇，您又不能接見。這樣，我不得不放棄促進我們友誼進一步發展的榮幸。我仍然希望，在明年展覽會期間，我從遠東旅行回來，有朝一日，能因和您重敘舊誼而感到榮幸和愉快。

最令人遺憾的是，德國竟然放縱其帝國的擴張侵略政策。為了一個暴君的野心而犧牲許多人的生命，這實在是最不人道的。

如果人民的意志和聲音能在政府事務中有適當的地位，這樣的政策就不能實行。人們高興地看到，現在公眾輿論將不能容忍這種帝國的擴張，因而，許多公正無私的國家為了人道主義的事業，已被捲入其中。毫不懷疑，正義的事業最終將勝利；我認為，多年備戰的德國將要接受這種教

^{*} 原載楊天石《近代中國史事鉤沉——海外訪史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

訓，以致使它在將來，在任意踐踏世界人民的幸福時，有更多的顧忌。貴國已經拿起武器反對這種全面的威脅；最使人欣慰和滿意的是，您的偉大的國家採取了寬宏而開明的政策。無疑，膠州歸還中國將鞏固正在增長的友情，密切我們兩國之間的現存關係。它將使世界相信，貴國對中國沒有隱秘不明的動機。儘管歐洲形勢紛亂，台端公務日增，祝您愉快健康。致以最熱誠的問候和良好的祝願。

您最忠誠的黃興敬上（簽名）

本函對德國帝國主義發動世界大戰進行譴責，表示了對正義事業終將勝利的信心，但其主旨則在婉轉而堅決地要求日本政府保證將膠州灣歸還中國。

膠州灣，一稱膠澳，地點約當今青島市及其附近地區。1897年11月，德國以兩個傳教士在山東巨野被殺為藉口，派兵強佔膠州灣。1898年3月，德國強迫清政府簽訂條約，“租借”膠州灣為軍港，時限99年。自此，膠州灣淪入德國帝國主義之手。但是，日本帝國主義也同時覬覦著這個優良的港口。1914年8月23日，日本對德宣戰。8月25日，日本政府藉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機，向德國政府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它在9月15日以前，“將全部膠州租界地，無償無條件交付於日本官憲，以備將來交還中國”。日本政府所稱“將來交還中國”是假，企圖取代德國，佔而有之是真。因此，9月16日黃興寫了上述信件。

沼野安太郎收到黃興來信後，次日就作出答覆。其英文打字稿也存於日本外務省。譯文為：

親愛的先生：

我非常高興地收到了您本月16日謙和有禮的來信，請允許我十分誠懇地酬答您豐富的感情，並且自由地展望世界事務。

我特別愉快地得知，在現時貴我兩國人民注意的問題上，您對於日本的態度不抱懷疑。日本許諾，如果膠州作為戰利品落入它的手中，將和中國公正地處理，而且感覺到，這樣一種方針，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明智和正確的。

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都經不起相互間的背信棄義，這樣做對他們也沒有好處。他們被上千種紐帶和需要加強友誼及好感的共同興趣聯繫在一起。如果日本獲得膠州，將歸還中國，因為她既沒有領土野心，也不被任何征服的貪欲所苦惱。我真誠地相信，將會再次榮幸地見到您，並請允許我向您保證，只要能有機會增進和加強我們之間幸福地萌發的友誼，我將總是非常高興的。

您最忠誠的沼野安太郎（簽名）

應該承認，沼野強調中日友好，表示兩國間有“上千種紐帶”、“被需要加強友誼及好感的共同興趣聯繫在一起”，聲明在獲得膠州後，“將歸還中國”，這是正確的。但是，當年11月日軍攻佔青島後，卻並不肯交還中國。直到1922年年末，才根據在華盛頓會議上簽訂的《解決山東懸案條約》由北京政府派人接管。

李大釗致佚名氏密笈試解*

——近世名人未刊函電過眼錄

李大釗一生寫過很多信，但留下的很少。國民黨中央原上海環龍路檔案中藏有李氏未刊函笈一通，彌足珍貴。函云：

手示悉。以瑣務未暇即覆，伏乞鑒宥。所欲介紹於趙君之友，乃山西人梁伯強君，其住址在天津英租界電燈房北路東第一號喬公館，已將趙君姓字函告此君矣（此函用日本書留，當無他慮），乞即設法通知趙君為禱！

* 原載《光明日報史學版》，2003年5月14日。錄自楊天石《國民黨人與前期中華民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局勢一變，將來恐不能徹底澄清。民黨以後宜善自妥協，勿再授人以柄也，惟明達圖之。匆匆不多及。此問近佳！

付丙！

弟 張潤之 李大釗

此函不署年月，無收信人，環龍路檔案題作《張潤之、李大釗致某君書》，可知當年整理檔案時收信人已無考。函中有“付丙”二字，要求收信人閱後燒掉，可知此函為密笈，更加值得重視。

函中提及的趙君，不詳何人。梁伯強，指梁善濟，山西崞縣（今原平）人。山西大學堂教習。1903年癸卯科中試，次年入翰林院任檢討。後赴日本，入法政大學速成科學習。歸國後，投入立憲運動，曾任山西諮議局議長。1913年被選為眾議院議員。1914年任教育部次長。1915年10月辭職。據“此函用日本書留”一語，可知張潤之、李大釗時在日本，在寫作本函之前，還寫過一封給梁善濟的掛號信（書留）。李大釗於1914年1月赴日留學，1916年5月歸國，本函必寫作於此一時區內。

時間大體清楚之後，接著需要研究的就是張潤之其人。他與李大釗連署，肯定關係密切，志同道合。經查，張潤之，字澤民，直隸武強人。與李大釗同齡，同為天津北洋政法專門學校同學，1913年畢業後同時去日本留學。1914年春，曾與李大釗共同翻譯日人今井嘉幸（政法專門學校時的老師）的博士論文《中國國際法》，在日出版。

張潤之與李大釗同富愛國思想。在日時，“談祖國政俗之衰，則相與唏噓感慨”。1915年9月，袁世凱唆使楊度等成立籌安會，謀劃復辟帝制，李、張都積極投入反袁鬥爭。同年冬，李大釗組織中華學會，從事秘密反袁活動。1916年1月，中華學會與湖南留學生組織的乙卯學會合併為神州學會，張潤之都是積極的支持者和參加者。

袁世凱的復辟受到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和以梁啟超為首的進步黨人的共同反對。1915年12月25日，蔡鍔在雲南通電討袁，成立都督府、護國軍，各方紛紛響應。本函有“局勢一變”之語，則知此函當作於蔡鍔通電之後不久。

當時，袁世凱雖然遭到各方反對，但仍保有相當的控制力量，北京、天津等地仍在袁的嚴密統治之下，所以本函中表現出一種小心翼翼的謹慎心態，除要求“付丙”外，還特別說明，寫給天津梁伯強的信係用“日本書留”，“當無他慮”，正是秘密工作的特徵。

由於袁世凱的倒行逆施和各派反袁力量的聯合，袁的倒台為期已不遠。但是，張潤之、李大釗共同認為，袁的勢力仍然不可能徹底消滅，擁護共和的力量必須克服矛盾，進一步加強團結。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在1913年反袁的“二次革命”後分裂為兩派。一派為中華革命黨，一派為歐事研究會；一派主急進，一派主緩進。此際，兩派正醞釀重新合作中。張、李二人看到了這一趨勢，函稱：“局勢一變，將來恐不能徹底澄清。民黨以後宜善自妥協，勿再授人以柄也。”這是對於當時政治形勢的清醒認識，也是對於“民黨”的語重心長的勸誡。

對抗與調和、鬥爭與妥協是矛盾的對立統一體。在人類社會生活中，不可能沒有對抗與鬥爭，也不可能沒有調和與妥協。在近代思想史上，李大釗比較早地看到了“調和”在自然與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他曾先後寫作《調和之美》、《調和之法則》等文，論證“宇宙間一切美尚之性品，美滿之境遇，罔不由異樣殊態相調和、相配稱之間蕩漾而出”。例如，美味，由苦、辛、酸、甜、鹹調和而成；美色，由青、黃、赤、白、黑調和而成；美音，由宮、商、角、徵、羽調和而成。本函中，李大釗主張“民黨以後宜善自妥協”，可以看作他的“調和”思想在政治上的運用。對於民初革命黨人中爭論不休、派系紛立的狀況無疑是一副有效的藥劑。

至此，本函的寫作時間、地點、內容已經大體明晰，還必須接著研究，此函的接受者是誰。

按，此函存於國民黨環龍路檔案中，它的接受者必然是孫中山系統的革命黨人。函中，張潤之、李大釗不僅對“民黨”的團結問題提出了具體建議，而且特別表示：“惟明達圖之”，顯然，受信人是革命黨人中有地位、有影響的高級人員。又據函中所述為“趙君”介紹居住在天津的山西人梁伯強這一情況判斷，則受信人必然是一位關心北方革命運動的人士。查，環龍路檔案中共存有

李大釗信三通，另兩通的受信者是張繼，則此函的接受者也可能仍是張繼，為出自同一來源的文物。

張繼，字溥泉，直隸滄州人，與李大釗、張潤之是大同鄉。他是同盟會的早期會員，辛亥革命後任河北支部長。1913年7月，參加“二次革命”，失敗後逃亡日本，繼赴歐美，發動華僑討袁。1915年11月回日本，致力於各派反袁力量的團結。李大釗1916年初有詩云：“義聲起雲南，鼓聲動河北。絕域逢知交，慷慨道胸臆。”這位可以“道胸臆”的“知交”，很可能就是張繼。白堅武1916年5月1日日記云：“候壽昌久不至，念極！聞與張溥泉同來，或亦不日可到。”壽昌，指李大釗。當時的上海是各派反袁活動的中心，白堅武是李大釗的密友，此際正在上海反袁人士間活動。上海反袁人士中既有李大釗與張繼同自日本回滬之說，則可證二人相熟，且有反袁活動方面的聯繫。此前，張潤之已先期抵滬，在進步黨領袖湯化龍、孫洪伊與革命黨人、雲南駐滬代表耿毅等人之間活動。5月1日，張繼隨孫中山到滬。不久，李大釗繼至。李到滬不久，即致函在日本的同志霍例白云：

此間自溥泉公來，各派意見消融無間，裨益大局匪淺顯也。昨濟公接川陳二庵電云，川決於箇日（廿一）宣佈獨立，湘亦不遠，而南京會議雖無結果，馮之態度仍有希望，其部下尤為鮮明。

濟公，指湯化龍；陳二庵，指四川巡按使陳宦；南京會議，指江蘇督軍馮國璋於5月18日在南京召開的15省代表會議，旨在討論袁撤銷帝制後的安排問題。此函顯示出，李大釗不僅充分了解張繼到滬後的活動，而且高度肯定張繼斡旋各派的功績，所云“各派意見消融無間”，正是上引密笥中張潤之、李大釗的主張“民黨以後宜善自妥協”的落實。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密笥的受信人是張繼，它反映出李大釗在反袁關鍵時期的主張，同時也可窺見李大釗在那個時期秘密活動的一個側面。

試解如上，不敢自以為是，謹以質之海內外研究李大釗的專家們。

“真革命黨員”抨擊黃興等人的一份傳單*

日本外務省檔案中，存有署名“真革命黨員”的傳單抄件一份，它是孫、黃兩派分裂後，孫派對黃興最猛烈的抨擊。全文如下：

黃克強君自癸丑失敗，遁逃日本以後，即志灰氣惰，謂民黨不能更以武力從事，宜從政治活動，以冀漸握政權，恒怯軍人，熱中政客，附和其說。熊希齡組織內閣之際，黃派日夜期望保皇妖黨，得與袁賊抗衡，而已則居中斡旋，冀博彼黨之歡，而分一杯之惠。《甲寅》雜誌醜詆民黨，貢媚熊、梁，實黃君授之意旨，章、胡（章行嚴、胡瑛）承其鼻息，迂謬之情已早為識者所竊笑。迨乎熊、梁失勢，彼等且自悟袁賊之兇頑，而黃派昏迷，迄未知政治之絕望。

孫中山先生自來三島，即懷恢復之心，糾合賢豪，冀達捲土之志，毅力宏識，血氣共欽。癸丑季秋，曾勸黃君之連袂；客歲仲夏，又曾三顧其草廬。情義殷殷，敦促不已。乃黃君平和之夢不破，緩進之說彌堅，始有樂不思蜀之心，終作乘桴浮海之計。若夫國力日削，文化日退，社會民生，日益凋敝而岌岌不可終日也，彼等不思拯救，袖手旁觀，以為國之貧弱，政之腐敗，猶可待十年徐圖匡救者。嗚呼！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天縱假彼以年，詎能久延病國之脈哉！

用是吾黨卓落之士，不謀苟合，一意孤行。國勢日益顛危，則吾人救國之志益銳；袁賊日益鞏固，則吾人革命之念益堅；人民日益厭亂，則吾人撥亂之心益切。誠以今日中國如患惡疽，當其根深蒂固之時，患者輒吝於一割，然而不割則生命愈危，故唯有不顧患者之苦痛，而一意操刀以施其手術而已。惜乎此不足以語於泥守方脈之庸醫也。

* 原載《檔案與史學》，1995年第1期。錄自楊天石《國民黨人與前期中華民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今者黃君與其同氣，發電國內，自明心跡，誓以不促革命，求諒於國人。內外同志，深為詫駭；其實固早在吾人意料之中，以為必將有此表示。綜觀全電，以生靈塗炭諱其不戰而逃，以寡眾不敵飾其無意恢復，詞固辯矣。然試問赫赫元勳，堂堂首領，既睹勝敗之數，胡舉烏合之師，是為不智；大難既發，旗鼓方張，師正報捷於淮、徐，將已遁逃於海外，負全黨之囑託，辜國民之期望，是為不忠。不智不忠，何以為口！若因即復戢兵，是乃仁術，試問吾黨敗後，塗炭幾何，惟以一逃，增其百禍，宋襄之仁，又何足取！不自引疚，徒逞辯詞，但求國人之見憐，不計立言之卑屈。觀其呶呶置辯，謂吾黨不致假藉外力，自取滅亡；又復委曲敷陳，極言袁氏罪惡，用心良苦，願對牛彈琴，究竟何裨！

夫國人果能辦理，吾黨安有失敗之理由？國人苟知向上，袁賊安有存立之餘地？況也，自約法改，議會散，人民失法律之保障，飽專制之餘威，人格無存，自由久喪，奴隸而已，何言國民！吾人正宜立林肯釋奴之願，舉湯武弔民之師，救之水火之中，登於衽席之上。若夫假藉外力與否，國人實無判斷其是非之智能。吾黨既以二十餘年苦心孤詣，取亡之滿室二百六十餘年者歸之國人，亦當然不致復斷送於他族。國人不能拒慣於賣國之官僚，自無煩其諒吾人救國之本意。國人既深願袁賊之執政，又何必訴吾人不滿之襟懷！故以若所為，徒啟袁賊之輕侮，滋國人之謠啄，灰同志之志望，而失自己之人格而已。國人果能以一電感動者，黃君又何至有今日耶！

真革命黨員

鐵漢

李直壯

尚氣節

鍾廉恥

史不屈¹

1 日本外務省檔案，MT16141，5563-5567。

1915年2月25日，黃興與陳炯明、柏文蔚、鈕永建、李烈鈞等聯名致電國內各報館，闡述對時局的看法和主張。其中，黃興等自悔民初與袁世凱進行政治鬥爭時的“叫囂凌厲之氣”，自悔1913年“二次革命”的孟浪，聲言當時革命黨人連“二次革命”的條件都沒有，“今無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進？”結論是：中國是否必須經由革命的道路才能獲得新生，還必須等著瞧。通電特別聲明自己不準備藉用外力來反對袁世凱政府。電稱：“邇者國交頓挫，舉國驚迷，興等乞援思逞之謠，又見騰播中外。”又稱：“至言假藉外力，尤為荒誕。興等固不肖，然亦安至國家大義蒙無所知？”¹本傳單即針對黃興等人上述電文而發。

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9月，日本政府乘機出兵山東，先後佔領濰縣、青州、青島。當時，國內人士和國外華僑界都出現了放棄內爭，一致對外的呼籲，革命黨人中也出現了聯袁制日的主張。在上海的詹大悲、白逾桓等一批革命黨人即決議“決不利用外患劇烈之時機為革命活動”，“暫時力持鎮靜，使政府得以全力對外”²。1915年初，日本向袁世凱政府提出21條，民族危機進一步加重，放棄內爭，一致對外的呼聲更為強烈。於是，何海鳴首先離日返國，宣稱“政府以穩健誠國人，國人以大任託政府”，“苟政府不加海鳴以不利，海鳴且以得正首丘於祖國為安”³。接著，林虎、熊克武、程潛、李根源等12人聯名通電，聲稱：“先國家而後政治，先政治而後黨派”，“政府苟能推誠明政，舉國傾心，即吾人客死他邦，亦所甚願”。⁴何海鳴的行動和林虎等人的電文都表現了放棄反袁鬥爭的傾向。黃興等人的通電正是這一潮流中泛起的一個浪頭。

在中國革命黨人中，黃興擁有崇高的聲望，曾被譽為“革命黨中唯一之實行家”，是可以和孫中山“並駕齊驅”的大人物。⁵

黃興領銜發出了這樣一份通電，自然引起了巨大震動，也引起了主張堅持

1 《黃興集》，第396—399頁。

2 《中國最近恥辱記》，第295—298頁。

3 《申報》，1915年3月8日。

4 日本外務省檔案，MT16141，5561-5562。

5 《革黨領袖黃興君事略》，《東京日日新聞》，轉引自《少年中國晨報》，1911年11月27日。